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十三辑)

总主编/李小明

马

艳

/ 著

北宋名臣毕士安与文彦博

北宋名臣毕士安和文彦博是今山西大同、介休人。在四五十年的为官生涯中，经历曲折丰富。他们二人皆德才兼备，为人严正，忠君为国，勤于政务，且政绩显著，名声扬于海内。他们是北宋晋籍元老重臣，也是后人称道的名相。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 编:刘冬梅

韩 慄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3辑)

北宋名臣毕士安与文彦博

马 艳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8125 字数:300千字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24-x

G·11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伟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一、毕士安	(1)
(一)仕宦生涯	(1)
(二)学有所成	(2)
(三)事母至孝	(3)
(四)为民请命	(4)
(五)以德称首	(5)
(六)博才多识	(6)
(七)知人善任	(9)
(八)胸有谋略	(11)
(九)身后扬名	(13)
二、文彦博	(15)
(一)少有才智	(15)
(二)宦途沉浮	(16)
(三)初露锋芒	(17)
(四)整改军队	(18)
(五)将帅之才	(19)
(六)体恤下情	(20)
(七)厚德之人	(21)
(八)临事有谋	(22)

(九)反对变法·····	(24)
(十)元老重臣·····	(25)
(十一)名闻四夷·····	(27)
(十二)老有所乐·····	(28)
(十三)文潞公集·····	(28)

毕士安(937~1005),代州云中(今山西大同)人。文彦博(1006~1097),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毕士安经历了北宋太祖、太宗、真宗3朝皇帝,为官近40年,一生仕途平稳。而文彦博前后任事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4个皇帝,在50多年的为官生涯中先后4次拜相,经历曲折丰富。他们二人皆德才兼备,为人严正,忠君为国,勤于政务,且政绩显著,名声扬于海内。他们是北宋晋籍元老重臣,也是后人称道的名相。

一、毕士安

毕士安(937~1005),字仁叟,代州云中(今山西大同)人。他端方沉雅,善谈吐,美风采,疏眉隆鼻,望之如冠玉,德才兼备,为人严正。更兼其一生淡泊清正,公忠谋国,勤于政务,是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老臣,也是后人称道的名相。

(一)仕宦生涯

毕士安一生仕途平稳,经历了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皇帝,为官近40年。

宋太祖乾德四年(966),毕士安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甲科,时邠州节度使杨廷璋辟幕府,毕士安为掌书记。开宝四年(971),选授济州团练推官。在济州2年后,太祖皇帝听闻毕士安之名,下诏觐见,于朝廷面授兖州管内观察推官。

太宗太平兴国初(976),毕士安任大理寺丞,兼三门发运事。太平兴国三年(978),知台州。第二年,迁左赞善大夫,知饶州,改殿中丞。不久,归朝为监察御史,后复出知乾州。

以母老愿降任就养，改监汝州稻田务。雍熙二年(985)，毕士安被太宗选中，任左拾遗兼冀王府记室参军。端拱(988～989)中以本官知制造。淳化二年(991)，毕士安任翰林学士。淳化三年(992)，毕士安与苏易简同知贡举，加主客郎中。后毕士安以疾辞职，改右谏议大夫、知颖州。

真宗在为皇太子前，以寿王治理开封府，淳化五年(994)，召毕士安为判官；真宗为皇太子，至道元年(995)，毕士安以兼右庶子迁给事中，其出入辅导，咨访谋划，从容与皇太子议论。真宗即位，至道三年(997)又命毕士安权知开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咸平元年(998)，毕士安辞去开封府职务，任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咸平二年(999)，毕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宋真宗特加其月给之数。景德初(1004)，入为翰林侍读学士，兼秘书监。景德元年七月，毕士安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景德元年八月，宋真宗同时任命毕士安、寇准二人为宰相，毕士安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位居寇准之上；寇准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宋代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景德二年(1005)，毕士安居宰相位仅1年，便薨于任上，卒年68岁。

纵观毕士安的一生，他虽然仕途平稳，但前大半生较为平淡，以在地方任职为多。直到67岁，真宗才任命他为宰相，惜任职颇短。

(二)学有所成

毕士安原名士元，后因避宋初诸王名讳而改名“士安”。据说，他的祖先原是周文王之后，出于姬姓，周文王的第15

子高封国于毕，所以后代即以国为姓，其家族在汉唐均有为官之人。毕士安的曾祖当过云中县令，祖父作过本州别驾，父亲任过观城县令。毕家世代在云中居住，后因毕士安父亲为观城令，而移家观城。毕士安生于五代乱世，其时毕氏家道已经渐渐衰败。3岁时，毕士安生母药氏早亡，父亲去世时，他也才20岁，毕士安“事继母祝氏以孝闻于当世”。

祝氏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而且治家严谨。她看到年少的毕士安非常好学，就拿出土安父亲在世时的数箱手抄书让他阅读。祝氏还非常注重对士安品行的培养，让他学习父亲为人的清白规检。祝氏认为，“学必求良师友”，而观城对毕士安来说，“孺子无可与游者”。于是，她多方筹集资金，陪士安外出游学。他们先到了宋（今河南商丘），不久发现宋的风气和观城相差无几。祝氏不知所措时，听说郑（今郑州）多有贤者，就和士安又到郑求师。在郑毕士安与著名文士杨璞、韩丕、刘锡等结为好友。这段经历使毕士安受益匪浅，他的学问也因此大有长进，能够博综群经，通诸子百家之言，究极古今治乱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义治民行己之本末。祝氏大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

（三）事母至孝

毕士安3岁时生母药氏早亡，父亲去世时，他才20岁。继母祝氏治家很严，并非常注重对毕士安学问和品行的培养，少年时即带他外出游学，结交良师益友。这样的经历使毕士安受益匪浅，对他后来的为人处事乃至整个一生都有很大影响。正因如此，毕士安“事继母祝氏以孝闻于当世”。

毕士安恪尽孝道，他的夫人也是至孝之人。在与继母相

伴的日子里，毕士安每日前往问安。祝夫人脸色有一点不快，他便细心侍奉；吃饭时在旁伺候，等祝夫人吃完才敢退下。有一次粉刷房间后，墙壁还没有干。士安给祝夫人请安，站的时间长了，有时靠墙而立，墙壁上压上了印痕他都不知道。为侍奉母亲，他甚至可以不要高官厚禄。有一次，宋太宗要任命毕士安知乾州，当时，祝夫人已老，毕士安考虑到从京城到乾州路途遥远，而祝夫人年迈不便，就上书请求降职养母，改监汝州稻田务。这表现了他对母亲至孝以及对功名淡泊的高尚情操。

（四）为民请命

在近40年的仕宦生涯中，毕士安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方为官，其治理州郡颇有政绩，而且尤为可贵的是，毕士安能够为民请命。

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王钱俶入侍，太宗选毕士安知台州。毕士安上任不久，即向太宗进言：“钱氏所辖地域，百姓交纳的赋税比原来多了很多倍。虽然给朝廷增加了收入，但如今临海百姓刚刚得到陛下的恩泽，应该休养生息，请陛下下令他们仍缴纳和原来一样的赋税。”太宗同意了他的意见，并下诏令官员执行。之后很长时间，浙江一带的赋税一直很轻。第二年，太宗派人到吴越之地查访官员的政绩，结果毕士安被推荐为第一位，从那以后，毕士安名闻朝野。

毕士安能够为民请命，而百姓也对他感恩戴德。据清庄文仲所辑《南宋文苑》之《思贤堂三赞·毕文简公》载：毕士安知饶州离任后，当地人感其惠政，曾画下他的图像供于庙中来纪念。

淳化三年(992)，毕士安知颖州时，颖州地面正闹饥荒。

毕士安便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并上书皇帝道：“颍州边界百姓多辗转流亡，是因为世道艰难，人民无以为赋租。臣请圣上免掉颍州当年的赋租，以安百姓之心。”太宗下诏从之。由此颍州百姓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毕士安自从为官以来，以严正著称。知开封府时，有近臣依仗权势抢夺了一个已经订婚的民女，受害者告到开封府，毕士安闻知此情，立即把这个近臣找来质问，并责令他把抢来的民女送回。宋真宗对这件事也十分赞赏。由此，人们多以毕士安严正而畏惧他，所以，每逢朝廷派人出外作官时，宋真宗必定让他们先到毕士安的府邸，让毕士安训诫一番，要他们不要在外边胡作非为。

毕士安每次面见皇帝，总是进言“去佞谀，近忠正，要在天下无事，人给家足”。拜相后，在他居位还不到1年的时间里，天下郡国丰登，刑罚衰减。江南除有二盗外，没有其他犯罪事件，海内安逸，称为至治。

（五）以德称首

宋兴40余年，中外安定，文学侍从、言语政事之臣，辐辏朝廷，至论德行，必以毕士安为称首。

雍熙二年(985)，宋王朝命分封的亲王到各地赴任。这时，宋太宗有鉴于历史的教训，对年轻的诸王很不放心，所以选择诸王幕僚时十分慎重。被选中的毕士安，任左拾遗兼冀王府记室参军。临行，太宗召这些幕僚入见曰：“诸子生长宫庭，未闲外事，年渐成人，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卿等勉之。”并赐给他们袭衣、银带、鞍勒马。毕士安很能领会皇帝的旨意，用心辅佐冀王，受到皇帝的赏识。端拱中，

宋太宗为选拔人才，下诏让各王府幕僚献上他们所著文章。《宋史》毕士安传载：太宗阅视累日，帝问近臣，曰：“其才已见矣，其行孰优？”近臣以毕士安对。太宗曰：“正协朕意。”经过仔细审阅，太宗认为毕士安确实有才气，可信可用，遂以本官知制诰，这时，朝廷的一些重臣也推举毕士安，宋太宗决定召他入宫，委以重任。这时，冀王入见请求留下毕士安，太宗却不答应：“朕不以爱子而妨用贤也。”

淳化二年(991)，毕士安任翰林学士。当时，有的大臣推荐张洎担任此职。宋太宗说：“要说学识和经历，他们二人是不相上下的，但是要说到人品的话，张洎比毕士安差远了。”虽然如此，毕士安仍以避父讳(父名义林)婉言推辞，只因朝议“翰林”与“义林”无须偏讳，他才就任。此后，毕士安留在朝廷担任要职，参议国家大事。

作为真宗的潜邸旧僚，毕士安极受真宗的信赖与重视。当初，中书职位空缺，真宗令辅臣历选，但都不称意，便谓近臣曰：“为朕选河朔有重德稀姓者处其中而镇之。”近臣喻解上意，便推荐毕士安。上果喜，遂用参大政，真宗找理由：“朕用毕士安为相，是梦见数神人拥一紫绶者，令拜朕曰：‘非久当相陛下。’梦中仔细看那个人，乃士安也。”毕士安、寇准为相后，真宗每得进奏边事，必付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你们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可见真宗对他的倚重和宠信。

(六)博才多识

毕士安博才多识，能够博综群经，通诸子百家之言，究

极古今治乱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义治民行己之本末。他一生治学严谨，据说，他写的字都很规整。毕士安多藏古书，博览无所不记，晚年视力衰弱，仍然读书不倦，亲自笔记，校正书中错误。毕士安为冀王府记室参军时，宫中人称毕校书，等到后来当上了宰相，宫中人有事还称其为校书。可见，士安之严谨诸人皆知。

毕士安具有超出一般人的见识。咸平元年，宋真宗下令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等书，欲印赐辅臣宗室。有的史官说，两晋的历史事件有很多是十分卑鄙龌龊的，不堪入目，不可再流传后世了。宋真宗以此事征求毕士安的意见。毕士安回答道：“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对于善恶之事，要如春秋笔法，有闻必录，载入史册。”宋真宗十分赞赏毕士安的意见，就命令继续校勘这些书。

景德中，陈彭年将毕士安文编为 30 卷印行，可惜今天少有存者。毕士安所著文章指物见意，有古风，不用当时文体，尤其擅长议论，其论朝廷事，奏议甚众。然退辄毁其稿。毕士安还精益词翰，其为诗篇，皆辩丽宏远。下录 2 首为例：

之一：

禁林宴会之什

好文英主古难齐，宠重辞臣意勿低。

睿藻清新刊翠琰，神踪飞动在璇题。

芸签许效蓬莱阁，花槛容模罨画溪。

乐圣朋侪开绮席，爱君诚抱挂金闺。

买臣晚遇知多幸，犬子端忧思转稽。

天地恩私无以报，只将兢慎对芝泥。

之二：

答王黄门寄密蒙花

多病眼昏书嫩读，烦君远寄密蒙花。

愁无内史兼词翰，为写真方到海涯。

第一首通过描写禁林宴会的盛况借以抒发自己忠君报国的心迹。诗的前4联，首先极力铺陈帝王诗篇的美好，睿藻清新只合刊翠琰，芸签应属蓬莱阁。接着又描写君臣和乐的盛况：乐圣朋侪开绮席，为后2联作铺垫。后2联承接前4联，其笔锋一转，抒发自己的情怀：也只有遇到这样的帝王，自己才有机会施展抱负。“买臣晚遇知多幸”，汉代朱买臣满腹学问，但怀才不遇。后幸遇明君，发迹变泰。毕士安写朱买臣，实际就是写他自己，借朱买臣遇明主喻自己遇真宗。纵观毕士安的一生，他虽然仕途平稳，但前大半生较为平淡，以在地方任职为多。直到67岁，真宗才任为宰相也可以说是“晚遇”。毕士安非常感激，觉得无以为报：成“天地恩私无以报”，惟有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而已。全诗开篇气势很大，睿藻、翠琰、神踪、璇题等词的运用，给诗增添了绮丽之美，颇似汉赋的写法。

第二首小诗也为抒怀之作。《柳亭诗话》言：对毕士安此诗，他的孙子将叔注解道：“家有唐人所摹十七帖、来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花诗一种。”杨升庵说：“此花可以染纸，引晋武帝以大秦献三万，赐杜预写《春秋释例》。则所云真方者，染方也。”由此可知毕士安此诗之意：他的身体一向多病又有眼疾，但仍然读书不倦，希望能够像杜预写《春秋释例》那样有学术成就，无奈力不从心。故借“答王黄门寄密蒙花”书

写才学无法施展的愁闷。

(七)知人善任

毕士安一生无妄交，他知人善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曾认为王佑、吕端等人有才干，都予以引荐和重用。王旦、寇准、杨亿以及少年交游的杨璞、韩丕、刘锡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王禹偁、陈彭年是他的门生。毕士安还向真宗力荐寇准为相。后来寇准为感谢他，把两个女儿皆嫁与他的次子。而韩丕、刘锡、王禹偁、陈彭年后来都成为名臣，只有杨璞数征不起，但有高风亮节，世人称之为征君。

王禹偁能成为名相，毕士安功不可没。

开宝四年(971)，毕士安选授济州团练推官，当时作为州民的王禹偁为磨家儿，年最少，曾经多次到毕士安的府中做事。王禹偁虽然相貌平平，但毕士安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他很有才华，就问他识不识字，读过书没有。王禹偁回答曾经读过一点书。毕士安又问他是否愿意舍弃家中的事跟随自己，王禹偁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就留在毕士安身边，毕士安教他读书为文，渐渐地，王禹偁的学识深厚起来。有一次，毕士安等官员陪州守饮酒，席间，州守出了一个酒令，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工整地对出。毕士安回府后，就把酒令写在墙壁，王禹偁看到后，在后面写上自己所对之令，其令非常工整。毕士安大吃一惊，于是此后便以客礼见之。州守令为“鹦鹉能言争似凤”，王禹偁对以“蜘蛛虽巧不如蚕”。由是王禹偁小有名气，后来登科及第受到朝廷重用，反而位居毕士安之上。时人以毕公为知人。

后来毕士安因开封府“近臣强抢民女”事件得罪权贵，

此事也牵连到翰林学士王禹偁，所以那个近臣每天在真宗面前诋毁毕士安和王禹偁。不久，王禹偁被谪黄州，而毕士安也罢职守潞州，时人皆归咎于王禹偁。士安却不以为然，他考虑到王禹偁家贫，便赠白金300两，使禹偁乃能为黄州之行。其后，当地人作堂，于堂上绘有毕士安与王禹偁二人的画像，每年都要敬奉，号称二贤堂。

毕士安推荐寇准为宰相也是一件盛德之举。景德元年（1004）七月，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并对他说：“我要用你为宰相，并非是今天才有的意思。如今天下仍是多事之秋，谁还可以与你共同担任此职？”毕士安说：“宰相之职，非同小可，必须要有能成大器的人才能担任，我已经年迈老朽，实在难以胜任，寇准忠义两全，善断大事，是我所不及的，我以为是宰相之才。”宋真宗说：“我听说他的性情刚烈，好动脾气。”毕士安答：“寇准为人正派，激昂慷慨，忘身殉国，办事公道，嫉恶如仇，是个有大节的人才，正因为他为人耿直公正，很少有人能比，所以有人反对并不足为怪。如今，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西北边境常有强敌骚扰，这正是起用寇准的时候！”宋真宗同意了毕士安的意见，但要用毕士安的“宿德以镇之”。景德元年八月，宋真宗同时任命毕士安、寇准二人为宰相，毕士安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位居寇准之上；寇准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毕士安可以称得上是寇准的知己，他不仅力荐寇准，而且还尽力维护他。寇准任宰相后，那些嫉恨他的人仍然在暗中捣鬼，伺机陷害，有个叫申宗古的人，诬告寇准私通安王元杰，令百官大骇，寇准闻讯也十分惊恐，不知所措。而毕士

安深知寇准的为人，就在朝廷上极力为寇准辩护，推倒了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并查清这个诬告事件的前因后果，将申宗古斩首。这样，寇准才得以安居其位，大展鸿图。此后，在契丹入侵签定澶渊之盟时，毕士安又是寇准最有力的支持者。

(八)胸有谋略

在宋朝众多的宰相中，毕士安受命于契丹南下的危难之际，他对内协助寇准力排众议，促使真宗亲征；对外积极策划宋辽议和之事，实乃当时政坛老成深谋的人物。

景德初(1004)，契丹谋入侵，当时，宋朝承蒙太祖、太宗休养生息政策，库廩充实，财赋富足，虽然边境有难，但朝廷兴造建设、恩赐如平日。面对此种形势，毕士安首先以之为忧。他疏五事应诏，陈选将、饷兵、理财之策，真宗嘉纳。其论遣将用兵使命转饷一事道：“国家的谷帛金钱储蓄，从平日来看是富富有余，但兴兵打仗，则恐怕有所不足，战争时片刻的费用，就有可能达到万金。半夜用餐，也须千金。更不用说大批财物有可能散亡或被劫掠了。臣如果不言明其中的道理，恐怕未罢兵而财已尽。那时，用什么应付敌人呢？对于英雄才武筹策有功于朝廷的人，朝廷要厚其俸禄，丰其财货，即使府库困窘也不足为惜。而对那些给亲近之臣的赏赐、僧佛的布施、土木修营之费以及后宫的无用开支等费用，希望朝廷能够免去，以补充军需。这样就可以得到为朝廷效死之人。”道理分析得很透彻，说服了真宗。

景德元年(1004)九月，契丹军队大举南侵，宋朝朝野上下都很震惊。宋真宗召见群臣征询退兵之策，大臣多主张迁都以避其锋芒，毕士安与寇准力陈其不可，认为如果迁都的话，容易使

人心崩溃，给敌人可乘之机。二人共同建议积极作好防御准备，并建议宋真宗亲往澶渊（今河南濮阳）前线督师，以振士气。于是，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这时，太白星白昼出现，百官议论纷纷，有的说大兵不宜北行，有的说应该迁都。毕士安因为生病未随真宗出征，他写信给寇准道：“今大计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心所愿也。”等到身体稍微好转，毕士安就很快赶到澶渊。这时，宋真宗亲自带兵数10万与契丹交战，声势浩大。契丹军前此遭到失败，不敢长驱直入，进军至澶渊境内，契丹大将萧挾览被宋军弓刀手射死，整个军队的士气大挫。于是萧太后派人向宋朝提出议和，朝廷惟恐有诈，真宗也说：“契丹自古为中原强敌，其犷悍之性，岂能柔服？况敌情不可测也。”此时，毕士安主张就此讲和，他认为契丹提出议和是可信的，对真宗言：“臣尝得契丹降人，言其虽深入，屡挫，不得其志，阴欲引去，又耻无名。况且，他们难道不怕有人乘虚覆其巢穴吗？他们请求议和当是真的。臣请陛下接纳。”由于宋真宗一直对抗战信心不足，加上主和派的影响，景德二年（1005）正月两国最后议和，双方达成的条件是，宋朝应允每年向契丹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下诏，河北缘边不得出境掠夺，得契丹马牛，要全部归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自此，两国边境通互市，除铁禁，招流亡，广储蓄。时间不长，宋朝北部边境得到相对安定。宋朝接受了屈辱的条件，主战派忿忿不平，而一般官员也埋怨赔款过多，毕士安却说：“不如此，契丹就会因得利不多而不愿议和，但恐怕即使议和也难以维持长久。”事实上，结果也确是如此，求得和平之后，大大有利边境百姓安居乐业。

澶渊之盟在当时得以签订是得大于失，是正确的。它解